

中国友谊出版公司

台湾散文选

美国 杨牧 编



台湾散文选

美国 杨牧 编

 中国友谊出版公司

1986·北京

台湾散文选

美国 杨牧 编

中国友谊出版公司出版
新华书店北京发行所发行
百花印刷厂印刷

787×1092 $\frac{1}{2}$ ·12 $\frac{3}{4}$ ·265,000

1986年9月第1版 1986年9月第1次印刷
社目: 147-202 书号: 10309·139 定价: 2.60元

序

柯 灵

《中国近代散文选》为台湾诗人兼散文家杨牧先生所主纂，经营两载，上起“五四”至三十年代诸家，下迄台湾当代作家的作品，遐搜博采，洋洋大观。中国友谊出版公司把其中台湾作家的部分，酌加调整，命名《台湾散文选》，移栽于大陆。近年台湾作家的小说，已有不少络绎渡海内来，有的已搬上银幕荧屏，诗也有了一些，而散文的荟萃问世，还是第一次。我有一种私见，以为在各种文学形式中，散文最具直抒胸臆的特点，便于心灵交流。今夕何夕，共此烛光，海峡两岸，蒹葭苍苍，也实在参商太久了。

中国自古为散文渊薮，源远流长，“五四”时代内经新潮涤荡，外受西风吹拂，在文学革命运动中先声夺人，成绩最为绚烂。七十年来，名家辈出，百体纷呈，孳乳繁衍，已形成一种富有民族特色的新文体。而世事惊涛，席卷天地，影响所及，散文的曼衍起伏，曲折正自不少。作家感觉敏锐，愤世忧时，致使腕底风雷郁结，文格偏于峻急，是很自然的事。而散文这一大河中的支流分派，因缘时会，或逐浪而奋飞，或因势而变风，或谢时而芜秽，互为消长，也成了不可避免的现象。文学是人类精神升华的表征。政治的辐射，时局的动荡，难免吹皱一池春水，但政治自政治，文学自文学，强使合流，等于焚琴煮鹤，此中况味，感受

已多，现在潮平岸阔，月白风清，正是洗盏更酌的时候了。

《台湾散文选》共收三十四家的作品，计七十三篇，三十余万言。庄容隽语，婉喻微讽，玄思遐想，抒情感怀，体貌品类，大致具备，而通体整齐和谐，显示选家谨严的识力和作风。编选体制中有一个特点，是循古人编选诗文总集的成例，每一作家，文前系以简明的传历，便于读者人文相印，增生亲切感。入选诸家，从年龄看，与“五四”同龄及二十年代出生的占小半，三十至四十年代的占大半，五十年代的只有三位。中国近代史忧患相乘，绵延达百年之久，这个时代的男女老幼，慨乎言之，都可以说是生不逢辰，反过来，当然也可以说生得其时，因为毕竟亲历了惊心动魄的伟大世变。但无论如何，总是多少经受过战争的洗礼，承担了世纪的怆痛，天地悠悠，幽州台上的感慨，千载以下，依然浸染眉宇。从籍贯看，籍隶本省的屈指可数，多数是家在大陆，蓬飘萍寄，因此离恨乡愁，时复缭绕笔端，“在异乡做梦，几乎梦梦是真。”北京亭园的牡丹丁香，四合院里的日长昼静；惊涛骇浪、咆哮东流的黄河，“杂花生树、群莺乱飞”的江南；不见于地图的无名溪谷，长留于心版的风土人情，都是作家神游的所在。在海岛土生土长的作家，向往的也是高原莽荡、落日苍黄的“幽幽思古之情”。从经历看，绝大多数是大学文科出身，又献身于大学讲坛，半数以上，且曾远涉重洋，有的学成归来，有的栖迟海外，掌教执业，最集中的地域是新大陆。这里鲜明地反映出台湾政治、地理、社会的特定环境和特定情势，自然也会影响作家的心眼手法。女作家数量比重不小，细腻、委贴、灵秀、豪放，各擅胜场，恰巧和大陆文坛近年出现的风光互

相映照。

三十年来，台湾文坛的风雨似乎不少，但在这片散文世界里，却有一种尘埃落定、水净沙明的气象，可以看作是台湾新散文成绩的一次检阅。台湾孤悬海外，新文学的土壤同样是“五四”，不过感受时地风水的折光，同中有异，异中有同。礼赞自然，剖析世态，缅归怀往，托物寄兴，友谊温煦，骨肉情亲，童年瞬息，记忆常新。这类传统的散文风格，滢洄流贯，一脉相承；但观察更为细密，视野更为开阔，抒忧发愤，更见深广，题材也有所拓展开掘。狭巷生涯产生“巷道意识”：区区心房，能载得多少宇宙的痛苦！但万家灯火，正在迎接归人，无线电里的新闻广播，也会望衡对宇，瞬间把世界勾连成一片。鸡尾酒会的热闹与殷勤，覆盖着人际关系的冷漠与虚伪。偏枯的物质文明，不但吞噬自然，而且荼毒性灵。寄生在现代化的西方社会，从护照到各种信用卡号码，构成整个生存价值的记号，“人生已经沦落到仅剩几个数字，几个数字就可以道尽人生”。失根的兰花，因风四散的蒲公英，门外即天涯的浮浪感与失落感，生活的新经验给散文图谱带来新意象，包孕着深邃的思索。表现技法也有新的体现，不同程度地从青涩转向黄熟，从清浅转向丰深，从直白转向蕴藉。有的铅华落尽，真纯始见，娓娓而谈，引人入胜；有的功候深藏，秀丽内含，闲闲而来，风致自见。据所知，六十年代的台湾，曾爆发“横的移植”与“纵的传统”之战，现代西方思潮风行一时，而在这些散文佳作中，却绝少见外来虚无消极的影响。可见中华民族载高履厚的历史和文化背景，赋予了后代多么强大的抵抗力和消化力。

特别动人的是“一颗远悬的中国心”，共鸣交响，渊渊作金石声，走得越远，回音越强。客居遥远的美国落基山下，爱倾听屋檐下水晶的羌笛，只因为容易牵动八千里的乡心。在西雅图的多雨季节，凝神静坐，细读台湾先贤遗诗，“一万里在缥缈烟波以外，三百年入断简残篇之中。”或者在雨中心越灵飞，效《楚辞》天问：“生命何来？万象何俱？文化何始？历史何展？而我又何自认？”瞿然惊觉此身远离灿烂文化的主流，脚下已不是孕育自己的乡土：“我来自雨水满布的三江五岳，来自中华文化的根脏，我的生命来自殷商实物深埋的沃土！……我的精神仍汇入本位文化主流之中，是这主流带动着我参与宇宙天机的生命运行的！”

还有更撩人心弦的呼声：

在中国，你仅是七万万分之一的中国，天灾，你可以怨中国的天，人祸，你可以骂中国的人。……当你不在中国，你便成为全部的中国，鸦片战争以来，所有的国耻都贴在你的脸上。于是你不能再推诿，不能不站出来，站出来，而且说：“中国啊中国，你全身的痛楚就是我的痛楚，你满脸的耻辱就是我的耻辱！”

因为古老的大陆，是“所有母亲的母亲，所有父亲的父亲”，“所有祖先的大摇篮”：素朴的事实，远胜深奥的哲理。而这种崇高的民族整体感，只有经过彻骨的震撼和灵魂的炮烙才能体会。五十年前，朱自清为《中国新文学大系》选编诗集，收前辈诗人五十九家，其中包括鲁迅、胡适、郭沫若、徐志摩、李金发这样的姓氏在内，而在《导言》中独许

闻一多为爱国诗人，而且“几乎可以说是唯一的爱国诗人”，而在台湾的散文家中，爱国热情力透纸背的，却指不胜屈，这是特别引人注目的。

我们还听到了“散文革命”的声音，提这个口号的是另一诗人兼散文家余光中。他有一整套醒目的主张：社会意义与美感价值不应畸重畸轻；正视现实，才能超越现实；真实的丑，优于虚伪的美；他揭槩从“五四”破茧而出，使散文与当代生活的节奏同步；作家要具有对现实的高度敏感，掌握文字的高度适应力。他悬想中的散文，“应该有声，有色，有光；应该有木箫的甜味，釜形大铜鼓的骚响，有旋转自如虹一样的光谱，而明灭闪烁于字里行间的，应该有一种奇幻的光。一位出色的散文家，当他的思想与文字相遇，每如撒盐于烛，会喷出七彩的火花。”他数量可观的散文创作，忠实地实践了自己的主张。试读读《听听那冷雨》，看看他对散文艺术作了多少探索与革新。以雨入诗文，古往今来，何止千百，而并非每一篇章都有自己独特的意蕴、意境、面貌、个性，自己独创的文笔。他使用重重叠叠的叠字叠句，参差错落，贯串全文。有的是近似的排句反复出现；有的是同声叠韵，如“走入霏霏令人更想入非非”，“隔着千山万山，千伞万伞”，别具匠心；句子的结构灵活多变，短句短到点点滴滴，一字一句，二字三字一句，长句象连绵不断的雨脚，一口气长到三十九字；杂以流动自然的少量韵语段落。方块字的形象性和平仄声，神而化之，竟凝结为一幅绵绵密密、千丝万缕的雨景，一阵阵远远近近、紧敲慢打的雨声，甚至那潮潮湿湿的雨意，清清冷冷的雨味，飘飘忽忽的雨腥，一齐进入读者的眼耳鼻舌身，同时渗透

每根神经。李清照的《声声慢》连叠七字，称“卓绝千古”；杜甫的公孙剑器，白居易的浔阳琵琶，王禹偁的黄岗竹楼，脍炙人口，都乞灵于巧妙的借喻形容，而《听听那冷雨》，却直接用文字的雨珠，声色光影，密密麻麻，纵横交织而成。这也许可以帮助我们对中国文字和现代文学的表现力增加一点信心，也应该承认这在“五四”以来的散文领域中，算是别辟一境。

台湾风物宜人，土地膏腴，却并不对艺术创造提供良好的条件。台湾文学的成就，我坚信将有公正的文学史家，作为中国当代文学史的一章，给以足够公平的评价。

为《台湾散文选》作序，我不是适当的人选，因为“寡人有疾”：我既粗疏寡学，又孤陋寡闻，对台湾文坛所知甚少，本集诸家的作品，百分之九十九是初读。去年五月，在国际笔会东京会议期间，有一面之雅者，不过杨牧先生等二三子；只是四年前在香港中文大学的一次现代文学研讨会上，有幸认识余光中先生，得开眼界，接触他的作品，自此锐意搜求耽读，以为暮年一乐。由于心折，难免偏爱，因此对他谈得比较多。希望不止于一偏万里，伊于胡底。鹊桥难度，心浮可接，妄言多头，读者谅之。

1985. 7. 18. 时在上海盛夏中

前言

一

杨 牧

根据我们的观察，散文之为文类(literary genre)，只有在中国文学传统里才看得出它显著的重要性。西方文学以诗、戏剧和小说为主，虽然其中曾经出现了一些结构圆融辞藻华茂的散文作品，借着它突出的艺术渲染和思维趣味，大略可以成为一种文类，但西方散文，不论长篇论著，或短篇小品，其赖以维系共相而成为文类的条件却又十分参差脆弱。以英国文学为例，则所谓思维趣味，有时专指作者的说理确当，尤其是对于文学和艺术问题的观察得体，乃成为可传的散文，例如卡莱尔(Thomas Carlyle: *Sartor Resartus*)和拉斯金(John Ruskin: *The Stones of Venice*)；而所谓艺术渲染，有时更指作者之脱逸一般单线的述说体制，赅赅然有叙事虚构小说之意，以情节胜，例如里利(John Lyly: *Euphues, The Anatomy of Wit*)和约翰生博士(Samuel Johnson: *Rasselas*)。真正的散文，以小品记述，寓言抒情，或议论说理自揭面貌，独自成篇者，在英国文学史中实不多见。如果我们用中国文学的标准来衡量，则除了培根(Francis Bacon)、拉姆(Charles Lamb)等少数大家的作品以外，可谓寥寥无几。英国文学传统的特征，也足以说明一般西方文学的现象。要之，上起希腊，下达美国，西方文学以象征虚构为其艺术之中心神髓，举凡诗、戏

剧、小说都奉之为圭臬。除了这三种辉煌的文类以外，则无论历史、哲学和文学批评都以辞达为目的，往往厚实而不雅致，欠缺艺术的丰采，所谓有笔而无文者也。

在此，中国古来关于“文”“笔”区分的观念，可以得到一个印证。文笔之说，历代学者聚讼纷纭，莫衷一是。我们调整角度视之，知道此说纵有其特殊的传统意义，对于中国文学而言，则如魏王之贻我大瓠之种，其实不能盛水浆，可以断定为无用而掊之；然而五石之瓠于我为无用，于他或许有用。其实，我们试以此说检视西方文学，便能断定其种种品类无不落入文笔二分之一中，直截了当，了无纠葛，其为例外者，即我们习称的做为一种文类的散文。反之，文笔之分对我无用，正可见中国文学最显著最重要的性格，昭然存在于这种做为主要文类的散文里。晚近比较文学者多以西方的文体结构观念印证中国文学，借以诠释中国文学的内涵和风格。庄子说宋人资章甫而适诸越，然而越人既已断发文身，又何必戴帽子？以上试以中国的批评观念体会西方文学，正如庄子所谓不龟手之药，于我固然平凡无奇，于他或有大用亦未可知。

散文是中国文学中最重要的类型之一，地位远远超过其同类之于西方的文学传统，原因在于它多变化的本质和面貌，往往集合文笔两种特征而突出，不受主观思想的垄断，也不受客观技巧的限制。古人为文，濡墨信笔，或叙事，或纪游，或议论，或抒情，思想和技巧屡迁，初无一致。然而文林辞苑，小品长篇，总不乏深刻的启示和趣味，通过翻陈出新的艺术渲染而出之。卡莱尔之体悟哲理，拉斯金之观照风骨，里利之翰藻波谲，约翰生之寓言讽谏，中

国散文中无不大备。其余培根、拉姆一支，则更充斥绂囊之中，更为中国文人酒后茶余分神轻易可为者。除此之外，中国散文之广大浩瀚，尚且包括经诰典谟之肃穆，庄列之想象，史传之笃实；唐宋大家左右逢源，高下皆宜；宋明小品另辟蹊径，其格调神韵对近代散文的影响更为巨大而显著。犹有甚者，我们还有汉赋的流动，碑铭的温润厚重，序跋文体的进退合度，奏议策论的清真雅正；外加骈文的严格规律，笺疏写作的传承精神，乃至水墨纸缘题款，尺牍起承转合的艺术，无不深入中国传统执笔者之心。典型既多，学者不乏闻问之道；一义偶得，体貌尚且不差，复能推陈出新，固然沾沾自喜；倘有败笔，作者心神之不宁，更恐怕不是任何西方文人写作散文时之所能想象。

我们对于散文，无非是因为陈义高，理想大，确认它是文学创作中最重要的一环，以古人的典型相期许，乃不免惟惶惟恐，用功远甚于西方文人，挫折不免，喜悦更多。读近代文学，我们更相信这七十年来的新体散文之所以不僵化腐朽，反而能通过一种新的语法，表现二十世纪中国人的感性体悟和观察，维系此一伟大的艺术传统于不坠，正因为近代中国散文作家心存此念，一脉相传，乃能进一步为中国散文的艺术精神下定义，证明其历久常新，永无止境。

二

我们所谓近代散文，专指二十世纪初叶以来，中国人以白话文为基础，实践新思想，开创新艺术，充分表现时

代的感性体悟和观察，而能于文学的大理念和结构方面承接古典的神髓，吸收西欧乃至日本风格的精华而不昧于诡趣，进而为这时代的文学提供新面目，甚至可望为后代勾画新风气的散文作品。

近代散文的发轫，应当就在二十世纪的初叶，五四运动和白话文倡议前后数年之间，所以至少已经有七十年的历史了。我们相信任何文学体式的产生都有其历史和社会的背景，则近代散文的成型也不能例外。简言之，近代散文的成型，除了依倚上文所提及的伟大传统，以古典成绩为理想的寄托，随时不忘一文学艺术命脉的传承之外，更直接拜受两股文学风潮之所赐，即宋元以来的小说，和晚明以来的小品——前者是近代散文白话面貌之基础，后者则为近代散文体制的启发。二十世纪初叶的散文家对于白话文的信心，毋宁悉数来自施耐庵和曹雪芹之辈的辉煌成就，严格说来，与当时北大教授之提倡“老嫗能解”恐怕没有太大关系。而且他们对于晚清文言小说之鄙夷，难免更加深这一份开拓新境界的信心——鸳鸯蝴蝶派文学的反面贡献或亦在此。散文家之使用白话抒写切身之思想与观察，体制方面则最接近晚明和有清一代的小品和笔记，其中影响尤大者，可推袁氏兄弟、张岱、李渔、随园、沈复等人。除此而外，西方和日本小品的影响虽非必然，也约略可见，不容忽视。就社会条件观察，光绪末年之废科举也可能对有志的读书人产生了巨大的冲击力，君子不器，遂能一心发挥其文学艺术的潜在力，而前人落拓侘傺的笔墨痕迹，竟蔚为我辈鹰扬多情，纵横干进的章法，顾忌既去，心血付之，时代的文体风尚不免为之一变。

二十世纪初叶的散文家转折崛起，波澜壮阔，为近代散文建立了不可颠扑的典型品类。所谓散文，归纳起来，不过以下七类：一曰小品，周作人奠定其基础；二曰记述，以夏丏尊为前驱；三曰寓言，许地山最称淋漓尽致；四曰抒情，徐志摩为之宣泄无遗；五曰议论，趣味多得之于林语堂；六曰说理，胡适文体影响至深；七曰杂文，鲁迅总其体例语气及神情。

以上七类散文的开山人物，都生于十九世纪末年，一个知识社会大变动的时代，旧学新知，莫不坚实。周作人（1885～1968）的小品上承晚明遗风，平淡中见其醇厚的一面；又在传统理趣上，注入他的日本经验，增加了一份压抑的激情。其人号称“杂学”博通，中外学识掌故知之最详，下笔闲散，余味无穷。近代散文受知堂笔路影响者最多，五十岁以上的作家如丰子恺、梁实秋、思果等人都属于这一派；他的基本风格也见于庄因、颜元叔、亮轩、也斯、舒国治。夏丏尊（1886～1946）作品不多，但一篇《白马湖之冬》树立了白话记述文的模范，清澈通明，朴实无华，不做作矫揉，也不讳言伤感，是为其特征；朱自清承其余绪，称一代散文大家，其源出于上虞。郁达夫、俞平伯、方令孺、朱湘、徐訏、琦君、林海音、张拓芜都可归入这一派；除外，如林文月、丛甦、许达然、王孝廉等人的作品也多多少少流露出白马湖风格。

许地山（1893～1941）博学沉潜，对于外国古典之认识不下于知堂。他深入梵文旧籍，结合传统中国的象征笔法，作品充满寓言点化的技巧，神韵无穷。沈从文的小说《月下小景》，近其旨趣，其他如梁遇春、李广田、陆蠡、王鼎钧

诸家都可归入这一派。其影响复见于司马中原、王尚义、林冷、罗青、童大龙等人的作品。徐志摩(1896~1931)以诗人之笔为散文，潇洒浪漫，草木人事莫不有情，激越飘逸，旋转自如，其文字最富音乐性，开创一代新感性的抒情文章，影响见于苏雪林、何其芳、张秀亚、胡品清、陈之藩、萧白、余光中；其他如逯耀东、张菱舂、白辛、张晓风、季季、陈芳明、渡也等人的作品也亦属之。

林语堂(1895~1976)偏重议论，但所议之论平易近人，于无事中娓娓道来，索引旁证，若有其事，重智慧之渲染和幽默人生的阐发，最近西方散文体式。言曦、吴鲁芹、夏菁的作品属于这一派。然而五十岁以下之散文家能得其风貌者绝无仅有，功力未及，恐将一朝而成广陵散。鲁迅(1881~1936)和胡适(1891~1962)各具典型。前者以深切泼辣睥睨三十年代文坛，称杂文大家；后者建立了近代学术说理文章的格式，证明白话文之可用，贡献良多。此二典型的散文重实用，不重文学艺术性的拓植，兹不论。

近代散文七十年，品类特征及源流略如上述。品类之归纳以最初滥觞者之风格为准，就时代言，七位先驱人物都生于十九世纪末年的晚清时代，他们成年开始执笔的时候，适逢中国新旧抉择艰厄困危的大风暴，意义非凡。我们相信每一种近代散文的品类都包涵了传统散文的本质，也都或多或少吸取溶化了外来的文学因素，此为其共同的艺术精神。至于各家各派独自发展出来的特征，则与作者之时代地域背景，学养功力，乃至客观经验有关。我们相信一个优秀辉煌的文学，一定是多样多义的文学，内容与形式不受外力的拘束，自由发挥，乃能殊途而同归。

关于“五四”以后始卓然成家的作者，以及近三十年来才在台湾脱颖而出的作者，我们以七种品类缕述之，乃是为了史览的方便，初无月旦高下之意。事实上，前文所述数十位作者当中，有些人便能兼容并包，博采众体；更有几位早在题材的处理，风格的转化和境界的开拓诸方面，超越了他们的先驱，这是毋庸置疑的。也就因为这几位后起大家不平凡的成就，使我们对中国新文学的生命，近代散文常青不萎的艺术风姿，更具信心。江山代有才人出，各领风骚五百年。每个才人的文学精神和风貌都须由他自己的秉赋学养和习性所决定，但无论他如何天机浑成，仍有可凑泊之处，他的文学精神和风貌必有一个或多个源头。我们相信文学的历史传承，相信真正的艺术必须超越地域和政治的局限，故能为近代散文家勾画一些试探性的源流梗概，然而泾以渭浊，枝可连理，则深入的分析 and 诠释，对于中国近代散文的进一步研究，仍待有心的学者从容为之。

1981. 6. 29.

〔关于杨牧《前言》的赘语〕年来读台湾散文，大率令我高兴，一若其小说、诗作——似曾相识，却时于清新中微微沁出一种生涩感，殆即所谓“别是一般滋味”。近得台北洪范书店1981年版《中国近代散文选》，编制甚精，其台湾部分尤多前所未睹，主其事者则我友花莲诗人杨牧也。我与杨君1982年内地旅行途中、1984年东京笔会席间两度过从，深重其温雅丽正富于诗味，而今看他小品也写得这样漂亮，集子的台湾部分又选得得体而可诵，作的前言又是理趣并茂，喜不自胜，以为是近年

海外寄赠中难得的好书，便急着向中国友谊出版公司推荐出版。落实到体例篇幅，我意先印原选的下编即台湾部分，而改署《台湾散文选》，如此最觉实际，盖劳生草草，总以有贵于无，早胜于晚，小晤终亲于远慕也。杨君的《前言》，原系说的全豹，此际未必一一合现存的格局了，但通篇纵论文体，闲评家数，学殖、见解、笔墨都有其高明独到之处，纵使分析判断与我未必尽同，却是绝不能割爱的。因此，这里照录了原文，只是由我作主略去了交待全书编选原则的末段，海天睽隔，这倒要请万里外的杨君一笑而见恕于我的。

朔望 1985. 7. 北京